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艾红红撰

61009.0/100

编号:

1022101-新闻学-新闻史-8-218
-421

申请北京广播学院文学博士学位论文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研究
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Television
Press of the New Period

培养单位: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研究生姓名: 艾红红 学号:

专业: 新闻学 研究方向: 广播电视史

导师: 赵玉明 导师职称: 教授

入学日期: 1999.9 毕业日期: 2002.6

内 容 摘 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我党 80 年新闻事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为主臬,吸收和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与成果,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发展进行了初步研究。

本文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新闻史学科多年来沿用的材料分析方法。宏观上,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相结合;微观上,则采取从分析到综合、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通过个案分析、比较分析,进而提升为理论总结。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改革进程进行了纵向省察,大致分为三个层级递进又各有侧重的历史阶段,即 1978—1983 年的改革起步期,1983—1992 年的改革拓展期,1992 年至今的改革深化期。其次,是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的结构转型(包括内容结构与形式结构两个方面)作了横向剖析;第三,是对新时期电视新闻的改革动因,从社会转型与电视事业自身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等三个层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寻;最后,则从角色定位与选择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基本规律作了尝试性总结,并对其进一步深化改革走向做了宏观展望。

本文通过考察发现,新时期以来,所谓政治化传播/政治“喉舌”角色与信息化传播/社会“守望者”角色可以说是电视新闻的两种基本的功能性角色。在计划经济时代,电视新闻以纵向的“上传下达”式信息为主,偏重于政治化传播,其角色定位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喉舌”角色;在市场经济社会,电视新闻则以横向信息为主,偏重于信息化传播,其角色定位于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守望者”角色;新时期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电视新闻传播则必然呈现出一种二者兼容,即政治化传播与信息化传播并存,“喉舌”角色与“守望者”角色兼具的特征——而且,随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此消彼长,电视新闻传播势必要根据社会转型进程的要求,对两种传播比重、两种角色形态尽可能作出分寸相宜的选择。从本质上说,新时期以来的电视新闻改革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强化“守望者”角色、不断优化“喉舌”角色的过程。这是新时期以来电视新闻改革的基本规律,也是我国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电视新闻发展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电视新闻 改革 “喉舌”角色 “守望者”角色

ABSTRACT

Tak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our party's 80 year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ies as the guideline, absorbing and drawing on the theory and achievement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this dissertation carries out a tentative research in the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V press in the new period in our country.

The material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in the research, which is continuously used in the branches of the journalism. In macroscopic view the thesis combines the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and lateral analysis with history and logic. In microscopic view it draws conclusions from the 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process from the analysis to synthesis and from the particular to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hesis:

First, it divides the reformation process of our TV press into three increased progressive levels and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at is, the beginning period 1978—1983, the developing period 1983—1992, the deepening period 1992—now. Secondly, it makes lateral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reforming of the TV press in the new period in our country, involving the content and form structures. Thirdly,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reformation it does the further researches in two sides: one is the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society, the other is itself developing with TV cause. Finally, from the angle of registering and selecting of the characters the dissertation draw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reformation of our TV press in the new period and prospects for the tendency of the further reformation.

The two main functional characters in TV press are called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tongue and the informational communication / the watcher of the society in new period. In general the inform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showing a heightening situation. The watcher of the society is coming to the front stage. Otherwise,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eems to be decreasing. In fact it is turned into a new form——from an extroversion diffusion to an introversion diffusion.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tongue is fading away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stage. The thesis reveals in theory in the tim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TV press transmitted the information "up and down", playing a role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registering itself as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tongue.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TV press is in transverse direction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being a watcher of the society. In the proced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to the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mitting of the TV news must present the features of the both. With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V news have to alternates its communication proportion and its character styles in both ways. In nature it is the course of strengthe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watcher and optimiz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tongue that since the new perio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V press. It is either the basic rul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V press or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V press in the changing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 TV Press Reformation the Tongue Character the Watcher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事业的历史回顾	(1)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事业发展鸟瞰	(10)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内容与方法	(15)
第一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初步展开	(17)
第一节 拨乱反正,初步走出“左”倾政治阴影	(17)
第二节 纵横联合,广开新闻信息渠道	(21)
第二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多向拓展	(26)
第一节 更新观念,拓宽电视报道领域	(26)
第二节 多向探索,改进新闻传播方式	(32)
第三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全面深化	(39)
第一节 干预社会,加强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	(39)
第二节 寻找“定位”,彰显电视传媒特色	(43)
第三节 调整结构,全面追赶世界先进	(47)
第四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的内容结构转型	(52)
第一节 经济新闻的崛起	(52)
第二节 社会新闻的繁荣	(56)
第三节 时政新闻的创新	(59)
第四节 当前我国电视新闻的内容结构分析	(62)
第五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的形式结构转型	(66)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电视新闻形式的演变	(66)
第二节 当前我国电视新闻的形式结构特征	(70)
第六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动因探析	(74)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推动	(74)
第二节 电视事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84)
第三节 科技进步的影响	(85)
第七章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规律试探	(89)
第一节 由一元至二元:新时期电视新闻的角色变迁	(89)
第二节 由显转隐:政治“喉舌”角色日渐隐幕后	(94)
第三节 从弱到强:社会“守望者”角色逐步走向前台	(100)
第八章 我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的宏观展望	(102)
第一节 新世纪我国电视新闻传播所面临的挑战	(102)
第二节 我国电视新闻深化改革的宏观思考	(107)
主要参考文献	(114)
附录一 1978 年以来我国电视台与电视新闻数量增长情况一览	(120)
附录二 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大事记	(121)
致 谢	(146)

导 论

所谓“新时期”，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中国化的概念，指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发 展时段。所谓“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也即为1978年以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与发展。

我们知道，电视新闻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新闻的发展寓于电视事业发展的 大系统之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电视新闻业的总体发展状况固然与其科技实力密切相关，但从其意识形态属性上说，由于它是电视人通过电视手段对正在变化的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一种最具政治性与现实感的电视节目类型，因而必然要受到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和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深入地研究、探讨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洞察其发展规律，就必须从新时期电视新闻所处的媒介环境谈起；更进一步说，则应从我国电视事业诞生的历史背景谈起。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事业的历史回顾

电视是20世纪的重大发明。一般认为，1936年英国BBC电视台的正式开播，是世界电视事业的诞生 日。几十年来，由于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电视事业体系，各个国家（或地区）都自觉不自觉地从不 同方面对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以各自的成就和特色构筑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电视文化景观。

我国大陆的电视事业开始于1958年，这年5月1日，国内首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试播成功^①。以此为起点，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与我国总体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电视事业作为一项由政府投资兴办的事业，是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规划下，主要依靠国家拨款，根据统一的行政指令按计划建设和发展的。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指令式发展

在中央台试播成功后，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也分别于当年10月和12月建成开播。1958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电视台。到1961年，

^①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9月2日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为了与现在的“北京电视台”（1979年5月开播，属北京市）加以区分，以下称原北京电视台为中央电视台，简称中央台。

全国已有19座省市级电视台建成开播。但次年由于国民经济发生困难,贯彻国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电视事业也采取了压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等相应措施,电视台数目一度锐减到只剩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沈阳5座。直到1966年底才恢复到13座。

1970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会同有关工业和电信部门,召开了全国电视专业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将集中主要技术力量研制彩色电视,同时适当发展黑白电视。之后,对彩色电视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以及恢复和新建电视台,成为中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工作的重点。1972年,在自创彩电制式的有关技术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经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派出有关技术人员,专程赴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荷兰和英国,考察他们的彩色电视制式,并对选购国外彩电设备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讨。在各地的积极努力下,1973年5月1日,中央台的彩色电视节目开始试播。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10月1日,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也开始了彩电试播工作。在电视台建设方面,1970年10月1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广西和福建等6个省区新建成电视台或实验电视台,并开始电视广播。至此,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所有省、自治区都有了电视台。这一年,全国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由1969年的25座发展到70座,中央台的节目传送范围也从1969年的天津、河北、山西、陕西4个省、市扩大到15个省、市,加上高山调频电视转播台的建设,电视信号基本覆盖了全国省会、自治区首府和大城市。而到了1978年底,我国已设立的电视台就已经有32座,电视转播台224座,同时一小批电视差转台也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①

电视事业是一项重装备、大投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必须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技术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实质性发展。我国电视事业却是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下起步的,因而其集中统一的管理运作模式显示了它的突出优点:国有国营,按计划发展,不仅可以较好地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按比例进行资金的投入与事业的建设,而且能够有效规避由于事业的无序发展或电视台分布不均衡等带来的诸多矛盾。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这种事业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台只负责技术与宣传,不负责经营,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过日子,因而事业自身也就很难产生规模发展与扩张的内在需求,只能依据上级政府的指令要求被动发展,长期处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状态。这样的机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电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一旦某些指令出现失误时,还会直接影响到事业的健康运行。

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政府对电视事业建设下达的很多指令、采取的许

①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内部资料:1949年~1978年广播事业统计资料汇编(1981).6

多措施,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明显不符的,但出于政治考虑,许多电视台在进行各项事业建设时,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既不讲效益,也不计成本,有的甚至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电视台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维持这些庞大机器运转的巨额费用却得不到基本保障,更不用说提高电视的有效覆盖率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从普通百姓角度看,购买节目不多、接收不良,却又价格不菲的电视机无疑也是得不偿失的选择。因此,至改革开放前,与电视台建设的初具规模相比,我国电视机的普及率却一直很低:1958年电视事业起步之时,全国仅有50台电视接收机;1973年彩色电视试播时,也才只有300台彩色电视机。直到1975年底,偌大的中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也只达到46.3万台,按当时全国人口7.2亿计算,平均1600人中还拥有不到一台电视机。^①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前电视台建设和彩电技术攻关所取得的成就,虽然表明了政治需要和政府行政控制对大众传媒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电视事业总体状况的落后,又恰恰说明对于大众传媒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推动以先进科技为手段的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不应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追求和规划电视事业的发展。

二、以传者为中心的偏于政治化的传播

如果说电视台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以及电视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电视事业“硬件”建设的话,那么,电视传播的观念与组织、内容与形式则应属于电视事业的“软件”建设。这是电视事业发展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上述“硬件”建设——即事业建设指令性、计划性特征的必然延伸,至改革开放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无产阶级的舆论宣传工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电视台的宣传方针和任务,都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由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统一部署的,因而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传者为中心的偏于政治化的取向。

在中央台试播前夕,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给中宣部、国务院并转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北京电视台(中央台)“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在实验期间,电视广播很难担负起党的各项宣传任务,但在定期的播出节目中,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观众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②。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电视传播的这一职责定位还是实事求是、也比较全面的。

^① 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2

^②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7.103~104

然而众所周知,自50年代末期起,由于党和政府在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失误,导致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严重偏移。反右、“大跃进”等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严重冲击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也使电视传播从一开始就染上了较为浓重的政治宣教色彩。以中央台试播第一天的节目单为例,这一天,在仅有的8个节目(总时长1小时左右)中,除了一个20分钟的舞蹈节目和一部苏联科教片《电视》外,其余全是配合形势的政治宣教片。其后,经过1962年的结构调整和1964年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电视传播中“左”的倾向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各电视台节目的质量与花色品种等也都有了一些改进。但总起来看,由于此后国家对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行政化管理、控制渐趋严格,致使电视工作者的思想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束缚。在这种新闻传媒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运行机制中,国家政治生活的种种非正常现象,以及党在某些时期的政策失误和指导思想偏差,也都无一例外地在电视上有所反映,从而直接影响了节目的质量与效果,降低了电视媒介的公信力。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把持下,电视传播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媒介传播的基本规律。当时,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大众传媒,都普遍存在着只贯彻、传达上级意图,不反映、也无视人民群众要求的现象,陷入了由传播者一方自说自话的信息运行“单行道”状态,使得媒体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一定社会的媒介传播事业总是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从根本上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传播中的上述政治化、单一化取向,主要就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50年代中期,我国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逐步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民经济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环节,都无条件地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和指令;各种类型的经济实体,都只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受体,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绝大多数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是围绕上级计划指令而进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被忽视,生产性、服务性信息的社会需求被抹杀。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控制权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断得到强化,从而也导致了政治控制的高度集中。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政府对于其社会成员的基本信念、政治理想、伦理准则以至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要求保持高度的一致和统一,“也就是确立以反映社会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国家意志’或‘集体意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使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实际上成为意识形态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以此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整合。”^①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言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势必顺应而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的总体要求:一方面,

①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75

它除了在贯彻上级意旨进行政治宣教和上情下达等方面可发挥作用外,在其他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调动其社会成员的劳动与生产积极性,而在缺乏实质性市场竞争和物质刺激的公有制条件下,政治思想教育或道德教化也就成为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法宝。因此,把(广播)电视看作“宣传鼓动的重要工具”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以至“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认为(广播)电视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而运转,对广大群众进行统一的政治宣传或思想道德教育,等等,无疑都是上述经济与政治体制交互作用的产物。

正是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电视传播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传者为中心,重政治领域、轻经济领域,重教育大众、轻服务受众,重主观宣传、轻客观报道的倾向,电视取材范围狭窄,禁区多多。对这一时期包括电视在内我国大众媒介的传播,学界有人提出了“大众化媒体,组织化传播”的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颇有见地、也较为准确的概括。

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节目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色。

1958年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上,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提出,电视节目应以新闻性、知识性和文艺性三者并重,而新闻性节目应力求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具有强烈的鼓动性。^①可以看出,这一对“新闻性”节目的定位,主要是偏重于其政治性和鼓动性。因此,在早期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除了政治性的外事活动外,大多是宣传性的先进工作经验介绍和模范典型人物报道。”^②如1958年5月1日中央台试播的第一天,放映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纪录片《到农村去》和一个为配合“五一”国际劳动节请当时的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的谈话,谈他们的跃进情况和今后跃进计划,算得上两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节目了;5月15日,中央台播放了第一个标题为“图片报道”的新闻节目《东风牌小轿车》,一个月后又第一次推出了本台摄制的新闻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此后中央台还曾不定期地开设过图片报道、评论、简明新闻以及电视实况转播等新闻性节目,但其内容与取向也都大致不二。

“文革”期间,在“事实服从路线斗争需要”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新闻工作起码的真实性原则也被人为的曲解。电视屏幕呈现给观众的,基本上就是“大批判,学习班;抓革命,促生产;工厂机器转,田间麦浪翻”等程式化内容,其中还不时充斥着诸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以及“批林批孔”等假、大、空的宣传报道。

^①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113

^②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86

1976年3月29日,在姚文元等人的严密控制下,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先后于北京和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为了丰富电视节目内容,提高宣传质量,更好地发挥电视宣传作用,应集中全国电视台的力量,共同创办一个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会后,中央台随即成立了有关节目筹备小组,积极筹划运作这一节目。同年7月1日,中央台的《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开始试播。试播当天,在时长约30分钟的节目中,总共只播出了7条新闻,分别是:

1. 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5'(上海电视台);
2. 小靳庄在斗争中前进。5'(天津电视台);
3. 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4'30"(武汉电视台);
4. 朝气蓬勃的党支部。5'10"(中央电视台);
5.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青年代表团。1'40"(中央电视台);
6. 谷牧副总理会见埃塞俄比亚政府贸易代表团。1'05"(中央电视台);
7. 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问红星中朝友好公社。8'15"(中央电视台)。^①

除三条外事新闻外,其余皆为没有时效的鼓动性政治宣传。电视新闻的政治化取向、信息匮乏和不讲时效,由此可见一斑。

国内新闻是这样,国际新闻同样如此。

在我国电视台(主要是中央台)早期播放的国际新闻节目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由国内记者赴海外拍摄的,绝大多数则是从外国新闻机构购买或与这些机构交换而来的新闻片。在对新闻内容的选择上,同国内新闻一样,国际新闻也主要是以“政治性”和是否具有“鼓动性”为取舍标准。以中央台为例,1958年5月,中央台首次播出的国际新闻片,就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的新闻。此后中央台还开播过一个《国际新闻》节目,其选择国际新闻的原则是:(1)重大时事新闻抢时间播出;(2)失去时效的时事新闻一般不选用;(3)反映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感情的题材优先播出,报道社会主义国家科技成就、劳动成就和人民生活状况,介绍各国文化、风景名胜的题材,择优选用。^②在这一新闻观念统摄下,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类题材不能进入我国电视的报道视野,就是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等无关政治的新闻,也都成为我们排斥的对象。最著名的事例莫过于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月的重大新闻,这一天,美国航天飞机“阿波罗11号”经过76小时的航行,顺利抵达月球。当整个登月过程通过卫星转播传送至49个国家,全世界7.2亿人共同收看这一节目时,在我国的大众传媒中却没有任何文字或图像的报道。受青睐的,是那些如《全世界反美怒潮澎湃》、《美国黑人在觉醒》之类宣传意识形态对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题材。

^①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55

^②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

在电视新闻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无论是与对方国家新闻机构签署互换新闻协议,还是对外输出电视新闻片,也都同样呈现出以意识形态划线、政治标准高于一切的特征。如1959年4月21日,中央台第一次把一条长约7分钟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专题报道”电视新闻纪录片航寄到苏联、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台;5月6日,再次对外寄送首都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游行的新闻纪录片,仍为上述几个国家。

早期与我国签订电视新闻交换协议的,也主要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由共产党组织主持的新闻机构。如1959年4月3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与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视委员会签署了广播电视合作协定,确定双方每月交换一至二次新闻报道材料,特别是反映两国人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材料。1960年7月1日,中央台又同日本共产党人主持的日本电波新闻社签订了电视新闻交换合同。^①此后虽也曾与国外的几家非社会主义系统的新闻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但大多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国际新闻的稳定来源。

1961年,应中央台要求,文化部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支持中央台做好出国片的工作。会议确定,为了提高出国新闻片的时效,以后电视出国片将改过去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审定为中心广播事业局直接审定。1964年,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的《宣传业务整改草案》中,又提出了中央台要“立足北京,面向世界”的方针,明确了中央台担负着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双重任务,从而推动了中央台与国外电视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至1965年8月止,中央台已同世界上27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交换电视片关系。

“文革”开始后,在极“左”思潮干扰下,中央台的对外新闻交流工作遭受了严重挫折。在“以我为核心”、“以左派为主”的宣传方针指导下,那些不看对象、不问国情、强加于人、自吹自擂的新闻片在国外很多电视机构都受到了冷遇。1967年6月15日,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中央台寄去的《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游行示威,支持法国工人、学生斗争》的电视片。这是自当年中法两国签订互换电视新闻的文化协定以来,首次获知对方采用我国寄出的电视新闻节目。而对于大多数外寄新闻节目来说,不但得不到播出,有的甚至还遭到对方的强烈抗议;更有的被陈放在对方国家海关,长期无人认领。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电视新闻,还应当指出的是,其时效性从总体上是相当差的。夏天讲春耕,秋天播西瓜上市的情况,在当时可谓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应当承认,这主要是由于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所致。对电视新闻业来说,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时效性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而我国电视事业却是在技术设备和经济投入都相

^①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139

当不足的条件起步的,一条普通的电视新闻片,从选题到拍摄再到播出的整个流程,一般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时效自然也就难以保证。当时,国内新闻的采制和拍摄用的是摄影机,胶片拍完后还要由记者自己冲洗,或送到洗印车间冲洗,然后再精心剪接,程序相当烦琐。有时为了制作一条不长的新闻片,就需要几个人不分昼夜地忙几天。同样是由于技术及资金财力等方面的原因,早期各电视台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和国际交流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国内新闻的采集和制作方面,各电视台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即使是把做好的节目交换播出,一般也都得通过人工寄送方式,从而使本来已突破了空间限制的电子媒介传播,仍需依赖原始的、受地点场所限制的面对面信息交换方能实现互动。直到1964年5月,北京、天津两地的电视台才第一次实现微波线路互传电视节目,天津电视台因此成为第一家通过微波线路转播中央台节目的地方电视台。1968年10月,太原电视台(山西电视台前身)成为国内第二家可通过微波干线传输中央台节目的地方台。直到1976年底,我国也才只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山东、内蒙古、新疆、西藏未通)可以通过微波干线或电视发射台接转中央电视台节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保证节目的时效性自然是很不现实的。而在国际新闻方面,大多数辗转从国外航空寄来的新闻片,就更谈不上什么时效了。

但也应当看到,早期电视新闻的不讲时效,决不仅仅是单纯技术的原因,其背后显然蕴含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无疑是新闻观念问题。这一时期,由于重在强调新闻的政治性和鼓动性,强调其上传下达的宣教功能,使得新闻本身应有的信息属性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时效性也成为对新闻退居次要位置的要求。同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信息供求相对单一的特点,也使得一般新闻的时效性成为新闻传播中相对不受重视的问题。这一点从早期电视新闻机构的设置就不难看出:中央台开播初期,其内部机构设置政治、文艺和文教等5个组,没有单独的新闻组,日常的新闻宣传由政治组负责。直到1960年5月,经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批准,中央台才成立了专门的新闻部。

然而,同样是为了配合政治宣传需要,早期电视媒介对于涉及国内重大时政事件的报道,例如大型政治集会活动、国家领导人接见活动及外出访问等,却是非常讲求时效的,并初步展现出电视传播声画兼备、迅捷及时的优势。如1958年10月1日,中央台正式开播后不久,就使用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辆黑白电视转播车,现场转播了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9周年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活动,晚上又转播了北京焰火晚会的实况。1959年的“五一”节、国庆节期间,中央台也对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各项庆祝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再如1960年“五一”节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天津市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天津电视台拍摄和制作了《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电视新闻片,报道了建国后毛主席第一次在首都以外和群众欢庆“五一”的这一盛况。节目当晚即与观众见面。

总之,凡遇此类全国性大型活动,或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政治活动,电视新闻一般都能及时报道,甚至是现场实况播出。至于其他的一般性新闻,所谓时效性则是根本谈不上。这一点,无疑同样是政治化取向的体现。

早期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是影像新闻,也称图像新闻或电视新闻片。即先由记者到新闻事件的现场拍摄到有关声像素材(主要是图像),继而经过冲洗、剪接、组合,构成一组意义相对完整的画面,再结合相应的文字稿等对事实进行报道的方式。由于早期制作新闻节目的器材大都是普通电影摄影机,因此,电视新闻的构图和采光一般都比较考究,“摆拍”、“补拍”等办法是经常被运用到新闻片拍摄过程中的。这些做法虽然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但在新闻宣传服从政治需要的年代,却又是可以理解和通行的。

图片报道、口播新闻也是早期电视新闻节目中经常采用的两种方式。1958年5月15日,中央台播出了一条4分钟的图片报道,介绍我国制造的“东风”牌小轿车。之后这种画面采用新华社照片或电视台记者自拍的照片,画外配音员的相关解说的形式便很快得到推广。1958年11月2日,中央台开办了一个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供稿、由播音员出图像播报文字稿的新闻节目——《简明新闻》,每次5分钟。这种脱胎于广播新闻的播报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口播新闻,很快也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得到推广。

此外,如上所述,实况转播(现场直播)也是早期各电视台在报道大型政治集会活动时常用的一种方式。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早期的电视直播还只能算是一种相对原始意义上的直播,与现在的“直播”概念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表现手法上说,由于我国最早的一批电视新闻工作者大都来自于新闻电影制片厂或广播电台,所以他们的新闻观念也受其过去所从事的新闻电影、新闻广播工作的影响。此外,当时的苏联新闻纪录片尤其是苏联人对于电影乃至电视“形象化政论”的定位,也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处于隔绝状态的我国电视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当时的电视新闻多借用电影新闻片、广播新闻或印刷文字的手法,新闻制作追求专题化、电视拍摄追求电影艺术化、电视新闻播音借鉴广播播音做法,以及新闻语言政论化等,就成为当时电视新闻的普遍特征,“影片加解说”、“新闻纪录片”、“报纸有声版”等说法则是对它的一种更为形象的描述。即使是从上述形式特征,也不难看出当时电视新闻偏于政治化的取向。

总之,从1958年我国电视事业诞生至改革开放前,在条件艰苦、人员匮乏、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电视新闻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不仅较好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的各项宣传任务,也探索出了一些适于电视传播的报道样式,他们以超常的辛勤和执著,记录了那段激越的历史,也成为那段历史所记载的辉煌一页。包括早期电视新闻界的对外

交流活动,虽然因为历史的局限而留下了许多遗憾,但对于宣传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树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样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电视技术远未成熟、电视机数量又少得可怜的情况下,电视新闻传播的优势远未发挥出来。首先,由于技术条件、人员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以电影胶片拍摄和人工传送为主、播出时间和次数都极为有限的电视新闻节目无法在时效与信息量方面与报刊和广播相抗衡。其次,由于电视机没有普及,收看电视基本上还是一种集体性、非日常行为,人们更容易把难得一见的电视看成是小“电影”或剧场转播的“缩微影剧院”,而不是新闻传播的主阵地。因此,那一时期,电视新闻的重要性虽然也曾经一再被强调,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偏差,我国的电视新闻事业基本上还处于学步阶段,与所谓“新闻立台”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事业发展鸟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尤其是国家经济从复苏到迅速发展,电视事业也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持续调整中,不断适应社会变化和人民大众需求,逐步呈现出事业建设与媒介传播全面繁荣、快速发展的喜人局面。

一、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业化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电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也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不断调整事业结构、改善事业运转模式为目标,逐步走向市场,尤其是在媒介的产业经营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978年以后,国内商品市场日渐繁荣。为解决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的问题,各电视台也审慎地开始了与“市场”携手的行程。其中电视广告的出现可谓电视事业向产业经营迈出的第一步。

我国电视广告的发源地,为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上海。1979年1月28日(农历1979年春节),上海电视台为解进口设备经费的燃眉之急,播放了我国大陆电视史上第一条关于“参桂补酒”的商业广告。1979年11月,中宣部下发文件,对大众传媒播发商业广告的行为予以认可。文件下发一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同时在两套节目中播出了商业广告,之后各地方电视台也纷纷效仿,广告业务迅速在全国的大众传媒中推广开来。广告业务的开办,使长期以来全部费用依靠国家拨款的电视事业,开始获得经济效益。截至当年年底,我国电视广告营业额就已达到0.03亿元。